

从“官本位”到“学本位”

近日报载,山东临沂大学在新的专业技术岗位竞聘中,8位具有正高级职称的在职处长“辞官从教”当教授,其中有教务处长、科研处长等“要害”部门的“一把手”。据悉,临沂大学以“导向教学、导向科研、导向高层次人才”为专业技术竞聘的基本原则,把高层次、高级职称、高学历人才向教学和科研一线引导,为此,教授的津贴待遇超过了处长,而且随着教授等级的提高,待遇数倍增长。当然,获得优厚的待遇也不容易,临沂大学同时规定了各级别教授岗位的要求,必须在任期内获得全国性的科研奖项或发明专利。

4年前,深圳一个处长职位竟有40位教授来争,曾引起强烈反响。在全国范围内,教授争当处长是个普遍现象,其原因就是官位的利益最大化,尤其是高校一些领导,把

行政权力和学术权力绑在一起,占据两方面的资源,相互“促进”。真正的科学研究受到冷落和排挤,这对于我国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发展,都带来极大的伤害。

临沂大学这次大力度政策倾斜,对高校扭转“官本位”是个有效的措施,也许是我国大学从“官本位”回归“学本位”的一个良好开端。用经济利益刺激人们的行为导向和价值取向,无疑是社会上一种简单并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是,历史告诉我们,真正有成就的学者在学术研究的进程中,对于真理性的追求,往往超过了甚至忽视了对个人经济利益的追逐。因此,不单单要保证学者们优厚的待遇,同时也要在社会价值评价、导向等方面回归正常,或许这才是更加长久之计。

课程体系,彼此脱节为哪般

■本报记者 陈彬

当得知自己的学生对光的成像规律都不太清楚时,郑文很吃惊。

郑文是国内某“985工程”高校物理系的一名老师,能考入她所在学校的学生应该都属于“高才生”。在她看来,像“光的成像”这样的物理学基础知识,学生们在高中阶段应该就已经烂熟于心了,但学生却告诉她,他们对这方面的知识并不熟悉。而当她问及原因时,学生们的回答又让她吃了一惊。

学生们说,在高中根本就没有讲过这方面的知识。

消失的知识点

郑文的吃惊是有原因的,因为在她的印象中,光学知识在高中物理课程体系中,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但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这个知识点已经从高中课程中消失了。为此,她专门在学生中作了一次调查。

经过调查,郑文发现,除了某些市属或省属重点高中毕业的学生外,二线城市或一般中学的学生,在高中阶段几乎没有系统地接受光学知识学习。

“一句话概括,这些年高中课改之后,高中课程与大学课程是完全脱节的。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学生们到底掌握了哪些知识,什么又是高中课程没有涉及到的。”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郑文坦言,这种状况使得大学里的老师不得不打乱原有的课程安排,为学生们“补课”。

郑文的遭遇并非个案。

作为北京化工大学教务处处长,姜广峰在担任行政职务的同时,也承担着本科生数学课程的教学工作。据他介绍,学生们来自不同省份的高中,有些高中课程中竟然没有讲授平面解析几何、极坐标等基础知识。由于老师在课堂上只能照顾大多数,一些学生就容易出现“跟不上”的现象。

“至少从目前来看,很多学科都存在高中课程体系与大学课程体系不衔接的问题。”姜广峰说。

课程体系的不衔接除了给老师们的教学带来麻烦外,受害最大的当然还是学生。

对于某些知识点“短腿”的学生,姜广峰采取的方法是通过讲座的方式补课。“把没学过的同学叫来,给他们讲讲是怎么回事。”但是“讲座”与“讲课”的一字之差,却注定了学习效果会大打折扣。

如此一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便摆在了人们面前:本应相互贯通的课程体系,为何忽然脱节了呢?

都是课改惹的祸?

在中国教育学会高中教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倪振民的眼中,不同层级学校间的课程衔接的问题已经不是新话题了。而这一话题的源起,要追溯到近十年前的一次改革。

2003年,教育部颁布了《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并在2004年正式实施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此次改革的亮点是把传统的课程体系变为领域、科目和模块结果。共设8个学习领域、12-13个科目,每一个科目又由若干个模块组成。允许学生根据自己的爱好与志向,作自主选择。

“

目前我国初、高中与大学之间,仅在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这五门主要课程中,彼此不衔接的知识点就达百余个。



图片来源:www.quanjing.com

好与志向,作自主选择。

“新课改主要是强调学生的素质教育,解决高中教学中教材老、课程难、内容多的问题,但同时也带来了课程衔接方面的困难。”倪振民说。

以数学为例,根据课改方案,数学课程被分为必修、选修共10个模块。学生必须学习必修课程,选修课分为“选修1”和“选修2”两部分5个模块,可供学生选择。由于学生并非“全面学习”,就导致了其在某些知识的学习上,难以做到如之前那样的系统化。

据倪振民介绍,类似的问题不单出现在高中与大学之间,在初、高中之间也同样存在。曾有人作过统计,目前我国初、高中与大学之间,仅在语文、数学、英语、物理和化学这五门主要课程中,彼此不衔接的知识点就达百余个。“改革体系的不配套,自然会出现不同层次的教育部门间‘一级怪一级’的现象。”他说。

值得庆幸的是,教育部已经成立了专门机构对此进行研究。记者曾试图联系该机构负责人,但该负责人并未接受采访。

让高考成为一个平台

同许多教育问题一样,高中与大学课程体系不衔接现象之所以出现,除了课改因素之外,高考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而对于像郑文这样的大学老师来说,这一原因似乎要更加“显性”。

“还是以光学的相关知识为例。”郑文说,之所以国内大部分高中没有将其列为物理教

学的课程内容,原因很简单——高考不考相关内容了。

对此,姜广峰表示,所有的教育改革最后都要涉及评价问题,而高考则是最为“终极”的评价标准。在社会层面,人们对于高中教育最重要的衡量标准就是学生高考升学率的高低。这就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高中并不是从学生的发展角度安排课程,而是高考考什么,学生就学什么。

“当然,这种做法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学生的发展显然没有好处。在这种情况下,我

不同声音

大学生知识体系存天然差异

“在有些人看来,课程衔接不足导致了学生知识体系的不完备。但需要注意的是,即使不存在衔接不足问题,大学生的知识体系也从来都不是完备的,教师对此的要求其实并不合理。”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北京大学教务部副部长、元培学院院长卢晓东说。

卢晓东表示,一名人大附中的学生和某农村中学的学生,即使不存在其他条件的影响,其对知识的掌握程度也大不相同。农村孩子甚至可能根本没有接触过计算机,而教育发达地区的孩子却已经掌握了很多大学课程,这使得学生的知识体系本身就存在天然差异。我们需要

们是否该对高考方案作出一定的改革呢?”姜广峰说。

事实上,这方面的改革早已出现。据倪振民介绍,目前已经有不少人提出所谓“2+X”高考模式,即全国范围内的统一高考只涉及数学和语文两个科目。同时,大学根据自身的类型和学科方向,将一些课程提前放到高中,引导学生在高一、高二时,便根据自身的未来发展方向作适当分流。

“这样的改革方案给我们一个启示。”倪振民说,那就是高考其实应该成为一个平台,在这个平台上,可以实现高中与大学的沟通。但显然,目前我们的高考还远远做不到这点。

“冷漠”的大学教师

当现阶段的高考无法满足高中与大学的沟通需要时,一些更常规的渠道就显得更加重要了。然而遗憾的是,这样的渠道如今也不尽通畅。

“当前我们的高中课程改革面临着一个问题,那就是很少有大学教师能够真正参与其中,并非我们不欢迎,而是如今的大学对于高中课改太过冷漠。”倪振民表示,高中课程的改革直接决定着几年后大学会接收到什么样的学生,这就决定了改革本身应是双方相互沟通的过程。但很多大学对于高中课改所秉持的态度却是:大学教不好是因为高中课程有问题,他们没有把学生的基础打好;而从不考虑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需要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的高中课程改革并非完全没有大学教师的身影。但他们更多地是因为行政命令或研究课题的需要参与课改,本身具有很强的功利性。同时,他们在教改过程中也常常扮演着“指挥者”和“评判者”的角色。“出了很多理念,但研究、商量得不够,反倒是指手划脚的居多。”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对比西方教育发达国家。”倪振民说,比如美国针对高中课程的改革,常常会有数以千计的高校教师关注,并亲身参与其中,与高中教师相互探讨。“因为他们明白,此时改革的成败,决定着他们未来水平的高低。”

倪振民表示,西方高校对于高中课改的高度介入有其自身原因,比如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大学联盟和民间基金,以及相对发达的NGO组织,而这些机构并不是行政体系可以完全替代的。“目前高中与大学的沟通不畅,其深层次原因来自于教育体制本身。”

考虑的是如何发挥学生的主动学习能力,使其在大学阶段尽快弥补这种差异。

“这就需要教师改变之前亦步亦趋的教学模式,鼓励学生主动学习、跳跃式学习。”卢晓东说,这几年,本科教学改革一直在鼓励本科生从事科研,这就是一个以问题带动自主学习的有益尝试。“学生不懂,自然会去钻研,这比单纯的课堂教学要好得多。”

“总之,学生的知识结构不完备本身就是自然状态,与其一味强调通过课程衔接加以‘弥补’,不如转变教学观念,让学生真正自主地寻找知识盲点,主动学习,这样的效果可能更好。”卢晓东说。

生前师友追忆罗阳——

“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

■本报记者 陈彬

刚刚听到罗阳去世的消息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教授王淦的第一反应是“不相信”,直到反复确认,他才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

11月25日,歼-15舰载机研发项目总负责人、中航工业沈阳飞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罗阳在执行任务时突发心脏病,以身殉职。王淦是罗阳的本科毕业设计指导老师。

这几天,王淦的心情一直很沉重。11月26日,正是带着这种沉重的心情,他参加了在北航举行的学习“航空报国英模”杰出校友罗阳同志精神座谈会。在那里,他和罗阳的生前师友一起,追忆起了罗阳的一点一滴。

“你是最让我们心疼的学生”

在王淦的印象中,罗阳是一个踏实、不张扬的学生,“他们是恢复高考后,我们专业的第一届学生,罗阳在他们班的年龄偏小,但功课十分努力,总是踏踏实实做自己的事”。

记得有一次,王淦去看望已经担任沈阳601研究所所长的罗阳。吃饭时,罗阳向他敬酒,王淦说你们所这么短时间取得了这么多成绩,很了不起,这都是你们辛苦换来的。罗阳的回答让他至今印象深刻:“王老师,忙是应该的,国家有这么多任务。不过王老师,您永远是的老师!”

和王淦一样,对于罗阳的英年早逝,罗阳大学时的团总支书记郑彦良也深感震惊。

其实在得知噩耗之前,郑彦良的心情本来很好。“当时所有媒体都在铺天盖地报道舰载机的成功起降,罗阳取得这样的成就让我非常激动,我本想打电话向他祝贺,但没想到第二天,大喜转为了大悲,真是让人无法承受。”郑彦良感叹,自己从事学生工作12年,接触了千余学生,他是自己最看好的几个人之一。“我始终不甘心,为什么这么优秀一个人就这样走了?”

在得知罗阳去世的消息后,郑彦良很想回校友友会看看。等到那里时,他发现有同样想法的老师不止他一个。那天,关于罗阳的话题他们谈了很久。最后,老师们决定由郑彦良为代表,向罗阳的家属发一封唁函。内容是:立志祖国航空事业三十载,罗阳你是最让我们骄傲的学生。

“其实唁函的最后还有一句话,因为怕刺激家里人,我们舍去了。那句话是——你也是最让我们心疼的学生。”郑彦良说。

“他是我们这代学生的代表”

今年7月,罗阳的大学同学组织了一次聚会。罗阳参加了,但没多久,就急着离开。

“那天罗阳参加了一个晚上的活动,第二天便要回单位。”陈舒霍是罗阳的同班同学,那天他

想挽留罗阳多待一天,因为第二天他们要去看望老师。但罗阳还是拒绝了。“他说不行,我要召开领导班子会议,后天还要去法国参加会议。”

罗阳这样的表态并不出乎陈舒霍的意料,因为在他眼里,罗阳就是一个全心扑在工作上的人。

就在去年,陈舒霍听说领导有意调罗阳到北京来工作。当他向罗阳问起这件事时,罗阳的回答却是一个重点项目没有最后完成,要在他手里把几个信号落实了才能安心。“应该说,罗阳用自己的实践和成果实现了他的理想,他是实现航空报国的最好实践者。”

对于罗阳的这份干劲,同样与他相处四年的老同学高松有着自己的理解。“在北航的四年,我们赶上了国家经济的恢复时期,学校的氛围是天天讲‘四化’,那阵子的我们都很单纯,就是想好好学,报效国家。这份单纯注定了我们一辈子就是这样走下去。”

在高松看来,罗阳应该是北航同学的代表,也是他们那一代学生的代表。“我们班的很多同学,现在仍然是各个重要项目的负责人,他们体现的这种坚守,是一个集体和一个时代的烙印。”

“献身国防的精神没有被我们遗忘”

在北航学习时,罗阳所在的飞行器设计与应用力学又被称为“5系”。如今,这一颇具时代特色

的称呼依然被沿用着。

马超是正在“5系”读研的一位学生。在十八大闭幕后,马超一直在学习新党章,而当得知了老学长罗阳的事迹,一个念头便在他脑海里出现了:“我想知道在新的党章中,能不能找到罗阳师兄的影子。”

于是,马超翻开了党章,找到了这样一段话:献身现代国防事业,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艰苦创业,树立正确政绩观,做出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我知道罗阳师兄的所作所为,经得起人民、历史还有国家的检验。”马超说。

随着对罗阳的深入了解,马超对罗阳说过的一句话印象特别深:航空报国是使命,不是荣誉!“对我们年轻一代的航空人来说,现在的社会中有很多浮躁、纷杂的现象。我们真的应该思考,如何才能自我认识,了解到自己身上肩负的沉重的使命,然后献身于国防建设事业。”

对此,在座谈会上,一位罗阳大学时的同学曾谈及,当时“5系”毕业生的出国率是最低的,大家都把自己的青春献给了祖国,他想知道现在的情况如何。马超告诉他,近几年在“5系”毕业的研究生中,有80%的同学都投身到了祖国国防事业中。“可以说,献身国防的精神并没有被我们‘5系’的年轻一代所遗忘,这种精神正在一代代传承,我相信她会永远传承下去。”马超说。

中国大学评论

大学培养目标及现有机制亟须调整

■尤小立

国观程代展师生的隔“网”争论,身为教师,在情感上是偏向程先生一边的。有些报刊上的评论缺乏对一认真从事科研工作,成绩卓著的老一代科学家的了解之同情,不仅居高临下地告诫程先生不必“昨夜无眠”,而且还口口声声地说博士到中学任教“不是浪费人才”。这就把原来观点的分歧上升到了道德层面,好像在程代展师生之争中,作为导师一方的程先生,颇有职业或岗位歧视。如果依此推理,博士或硕士生排队应聘环卫工作,就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下基层”,“与广大劳动人民相结合”,就更为合理了?

一些评论涉及到大学教育的培养目标与个人选择的矛盾,包括中高等教育之间的差异,这些确是可以进一步讨论的问题,但以当下中国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状况来看,程先生希望学生继续从事科学研究,以及有关国家对博士生培养的大量投入的感慨,都是有依据的。当然,这里的“依据”是就大学或研究机构的现有机制而言,因为进一步看,这个“现有机制”也已经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候。

自从上世纪90年代初,大学扩招以来,各类大学的应对措施基本都是形式上的,追求大而全,追求学科的无限扩张,这种考虑硬件,考虑外在适应的应对方式固然是基础之一,但就方式上说,也是最为原始和粗放的,它的局限性正在日益显露。因为是外在适应,接下来的机制调整,也必然是外在的。像如今大学的“一切面向就业”,不是提升大学的水平和发展大学的功能,而是让大学单一化,变得越来越像职业培训中心。

其实,机制的合理调整首先取决于培养理念的转变。高等教育“大众化”后,过去精英教育时代培养人文学者、社会科学家、科学家的目标和追求也必然被淡化,取而代之的是职业选择的多元化,这应该是社会的一个进步,但如何适应这个多元选择,却需要积极面对。因为“大众化”以前的大学教育是精英式的教育,所有的课程和教学方式都是为“提高”服务的,而现在,“普及”是主流,“提高”是在“普及”基础上进行的。在这个问题上,不仅是程代展教授不适应,实际上许多大学在课程设置和教学方式上也未作出相应的调整。程先生所感慨的国家对博士生的大量投入与职业选择的反差也确是事实。但实际上,这与投入多少无关,而是一个政策的问题。因为博士生本来属于“提高”一类的,只能是专而深、少而精的,现在却为研究生招生和管理政策的失当,加上社会上片面的高学历要求,使博士生招生规模不断地扩大,导致博士生过剩,以至于博士生们不得不作出与博士培养目标不一致的职业选择。

用培养科研工作者的方式培养未来可能从事各种职业的学生,自然是不合理的,但如果仅仅满足于一般性培养,大学又如何追求卓越呢?从理论上说,高等教育“大众化”是不应该以降低大学整体的教学水平和学术研究水平为代价的。大学里的“普及”教育对于社会而言是一种“提高”,而大学里的“提高”则是在相当水准的“普及”之后才可能实现的。但现实的情况是,大学的整体水平在降低,而真正行之有效的应对措施,却未及实施。

一些大学为了遏制颓势,模仿中学搞起了校内“重点班”或享受特殊政策的学院。可是,从此次程代展先生希望左右学生的个人选择和未来而受到质疑,且未能如愿的实例,也不难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类似的校内“重点班”或特殊政策所显示出校方的包办代替以及培养机制上的有病乱投医式的行为,不仅不能扭转颓势,而且可能损害大学教育的公平原则,它也肯定会受到大部分师生的诟病。

应该看到,当下中国过于迅猛的高等教育“大众化”在挑战着大学的核心价值或者说赖以立足基础的同时,也将所有的大学教师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具体地说,如果你的学生以后根本不从事你所从事的专业,你的专业知识传授还有什么意义?作为导师,你明知你的研究生不会走你的路(像程代展先生所遇到的情况),不会从事他学习过三年、五年,甚至更长时间的专业时,你还有以前的动力、热情去培养和督促他们吗?责任感的建立是有条件的,决不是用那种食洋不化的简单方式(比如让研究生导师全额资助学生)就可以解决的。现在的关键是,我们的大学是否已经意识到这一挑战和这种困境?是否想在体制和机制上为此作出些令人信服的改变?